

文章编号: 1003—2398 (2002) 01—0077—04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张楠楠¹, 石爱华²

(1.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10093;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深圳 518031)

INFLUENC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ON CHINESE GEOGRAPHY

ZHANG Nannan¹, SHI Ai-hua²

(1. Department of Urban & Resources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Chines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at Shenzhen, Shenzhen 518031, China)

Abstract: Western missionaries first came into China with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left the history stage in which they worked as the media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ir development changed with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Chinese government. Combining analysis in the prosperity and decadence progres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on Chinese geography in phases and summaries their most important monographs in geography.

The whole course includes three separate phases: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Yuan Dynasty,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phase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first phase, the dispersion of culture at this time and participating means self-adaptation behaviors to the missionaries. This kind of cultural dispersing had a small scale, and fewer influences on Chinese society. After the distinct of Yuan Dynasty, the same time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y and the time of great discovery in geography, the importanc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reached a climax.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roduction, these merchandises and trade, missionaries coming into China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geography. Almost every one of them had monographs about mapping and geography. These devotions do contribute greatly to breaking the boarder of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Chinese geography to the whole world including the west by communication letters, Chinese maps and other forms. Besides, western missionaries' introduce of their geography richened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s of Chinese scholars greatly and broadened their envision. As a result of Chinese becoming a western colony after the Opium War, missionaries participated in more practices of introducing sciences accompanying changing behavior and mind of China. This is also the result of being behind in sciences and a need of advancing in technologies in our country.

At last of this paper, using dialectic method, the author appraise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eography as they introduced western advanced geography into China and made Chinese geography a part of world geography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as a consequences of their religious aims, they led Chinese to misunderstand geography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led to a less important degree of western geoscience's dispersing in China.

Key words: western missionaries; Chinese geography; influence

收稿日期: 2000—07—11; 修订日期: 2000—09—20

作者简介: 张楠楠 (1977—), 女, 吉林省白城市人, 99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经济与人文地理研究。

提 要: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 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 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 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 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

关键词: 西方传教士; 中国地理学;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919 **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 无论是对西方文化的传入, 还是对中国文化的传出西方传教士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地理学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因此, 研究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谈到传教士, 首先就要提到基督教, 因为在基督教以前, 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主要是通过边界居民的相互交流而从地域上逐渐传播开去的, 而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却主要以一种特殊的媒介进行, 即通过传教士来传教。

传教士在唐代就已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进入我国, 到 19 世纪末, 由于中国知识界自身的觉醒, 传教士的媒介作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期间由于各中国对宗教政策的变化而使传教士及其传教规模出现了几次大的起伏,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相应地本文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也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这三个时期为: 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

2 唐元时期

对于传教士来说, 这一时期对于文化传播的参与主要是一种自发的文化适应性行为, 即在中国要生存, 就必须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解并对中西文化进行认识比较。同时, 唐元时期是中强西弱的时期, 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回国后的讲述、出使报告和游记等形式把中国的地理知识传到西方。但由于这种文化传播规模小, 加之当时人们的科技意识差, 对社会的影响较小。

2.1 《出使蒙古记》

这是意大利来华的天主教士柏郎嘉宾回到欧洲后所作。其中涉及中国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在游记中, 他将中国称作鞑靼, 将之说成是一个多山、多沙漠、少水、气候变化无常的国家^[1]。

2.2 《马可·波罗游记》

为马可·波罗所作。马可·波罗虽然不是传教士, 但因

对罗马的天主教传入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而在中国的基督教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该书讲述了北京、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杭州、泉州等地的地理风貌、气候物产等。他的著作出版后,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些欧洲地理学家根据它绘制早期的世界地图; 著名探险家哥伦布就是从此书受到鼓舞和启示, 钦慕中国的文明富裕, 冒险作东航海上旅行的。

3 明末清初^[2-4]

元朝灭亡以后, 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停歇了很长时间, 直到 16 世纪末由于西方殖民地的拓展, 又重新在中国传播。由于麦哲伦、哥伦布环球旅行和美洲大陆的发现, 16、17 世纪被称为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展的时代, 因此也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产生影响的最重要时期。

3.1 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也多重视地理学, 几乎每人都有地图测绘方面的实践和地理学方面的著述, 也正是他们这方面的贡献, 才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摆脱了地域隔绝的局限, 对地理空间有了更广泛的认识。

3.1.1 地图及地图测绘术

明末以前, 中国从未出现过世界地图。中国人也只知道亚洲、部分欧洲和非洲的知识, 之后中国人对世界的完整的认识, 便来源于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

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传入的《万国舆图》。与世界地图结合在一起, 利马窦同时介绍了许多西方先进的地理知识, 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制图学的发展作出奠基性的贡献。他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主要是大地球形说、地球海陆分布五大洲(亚细亚洲(亚洲)、欧罗巴洲(欧洲)、利比亚洲(非洲)、亚墨利加洲(美洲)、墨瓦腊尼加洲(南极洲))、四大洋(大西洋、大东洋(太平洋)、小西洋(印度洋)、冰海(北冰洋))说、地球气象结构五带说(利马窦的地图以赤道为中心, 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 并画出了南北二回归线, 南北二极圈线, 相应把气象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再就是利马窦的地图首创了一些地理学名词和国外地名的汉译法。有些译法一直沿用至今, 如地球、南北极、北极圈、赤道、地中海、尼罗河、罗马尼亚、罗马、古巴、牙买加、加拿大等。1854 年利马窦完成了地图的中文标注, 出版后取名为《山海舆地全图》。这是第一张在中国仿制的世界地图。由于利马窦在标注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中国图籍, 如《大明一统志》、《广舆图》、《古今形胜之图》、《地理人子须知》、《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等, 《山海舆图》中关于中国的海岸线、城市山脉和水系则比原图刻画的翔实。

利马窦所传入及绘制的世界地图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和毕方济又继续对其作了增补。庞迪我增写了利马窦地图中所涉国家的风土、物产等内容, 撰成《山海舆地全图》。另外还绘制过四幅地图, 图的周

边介绍了图中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政治和自然物产等情况。毕方济作有《坤輿全图》，附有小图三幅，图中有“地本圆体”的说明。到明崇祯时，传教士汤若望作《坤輿全图》12幅，地图按经线切割而成，每30度为一幅。图的说明中，他介绍地与海合为一球，地球居天体中间。1674年，传教士南怀仁又在北京刊印《坤輿全图》，图中的文字介绍了国家、气象、潮汐等情况。图中共介绍了大陆国家42个，岛国21个，海洋名称27个，海上连接中西的航线两条。1767年，传教士蒋友仁出版了他的两半球世界地图《坤輿全图》，在图的释文中，他特别提到了法国大地测量家所证实的地球是椭圆的说法。同时指出地球不是天体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把哥白尼的日心说传入中国。

西方地图测绘术也是由利马窦第一个介绍到中国的。即投影作图法中以经纬度来确定某地的地理方位，这要比中国古代人传统用的“计里画方”定位法准确。经纬度定位法，改变了古代中国人对地球形状“天圆地方”的认识，相信地球是球形，从而对中国人的宇宙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于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利马窦的世界地图也有一些错误，如他把地球当作宇宙的中心，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他的地图上没有澳洲，南极洲也被绘的太大。

3.1.2 协助绘制中国地图

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用他们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参与了中国全国的地图测绘工作，即《皇輿全览图》和《乾隆内府地图》（或《乾隆十三排地图》）的编制。期间，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全部的智慧，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首创的全国性的测绘工程，《皇輿全览图》的意义还在于体现了传教士在地图测绘方法和测绘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和改进。它采取了先进的投影测量方法，使定位更加精确^[5]；它通过实地测量证实了牛顿的“地球扁圆说”；它使清廷实施了全国测量的统一丈量尺度，“它在测量中把长度单位与地球经线每度的弧长联系起来，在当时是一创举，是以地球形体来确定尺度的最早尝试”^[6]；它第一次标出了世界最高峰——珠峰，第一次对台湾进行了全面的实测；它显示了我国东部海岸地形的快速变化情形，为古地理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由于新疆战乱的影响，康熙年间所测的《皇輿全览图》没有包括哈密以西的新疆部分地形。到乾隆年间，战乱得到平息后，又组织传教士进行了补充测量，最后由传教士蒋友仁编成《乾隆内府地图》。全图地域北到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到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是当时最大的亚洲地图，它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在制图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7]。当然，《乾隆内府地图》也存在某些错误，如对我国和俄国的边界标注的不够清楚等。

3.1.3 地理著述

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艾儒略1610年来华，因学识渊博，兼通中西，著述丰富，被誉为

西来的孔子。他在毕方济、庞迪我等人工作的基础上，用中文写成《职方外纪》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中文写成的世界地理著作。书首为一幅世界地图，名为《万国全图》，图为圆形，按天度经纬分360度，图上标南北两极，表明是全球图。《职方外纪》中对各国风情、世界地貌、文化物产等方面的介绍要比利马窦所介绍的详尽。

此外，艾儒略还著有《西方问答》上下两卷。它分条介绍西方的风土国情，包括疆域、人口、路程、土产、西学、官职、服饰、法度、商业、医药、宫廷、兵备、城镇、历法、堪舆、数学等，此书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3.2 中国地理学知识的传出

把中国的地理学知识传入西方，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影响的另一个方面。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知识的介绍同样也主要是借助中国地图和著述的形式进行的，其中也包括一些书信，它们成为西方认识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直接资料。

3.2.1 传往欧洲的中国地图

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地理学的同时也传入了中国的地图，从而使西方人更准确地从地理空间上认识了中国。

1590年，传教士罗明坚把中国最早的刻板印刷地图的中国地名译成西文后献给罗马教廷。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情况；后来由来华的一西洋传教士翻译的《古今形胜之图》传入西方，它不及《广舆图》精确，只是用简练的文字和图形介绍了中国各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主要由传教士完成的《皇輿全览图》也被传入法国。1750年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向法国寄过一份关于长江三角洲至湄公河的地图，上边注有许多中文地名和注释；传教士雷孝思把一幅中国人绘制的有关中国与里海之间各国的地图寄往法国；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在给法国神父的长信中，附寄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的地图。

3.2.2 地理著述

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在罗马出版《中国大帝国史》，这是欧洲第一本介绍中国地理的著作。出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德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对中国的地理知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把中国的地理知识介绍给西方的过程中，利马窦同样是传教士中最杰出的一位，在中国生活的三十多年中，他到过中国的江南、华北、华南等许多地方，加上他雄厚的汉语知识，他的著作《利马窦中国札记》较全面真实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知识，出版后在欧洲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书的第一卷对中国当时的名称、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1602年庞迪我在写给古斯曼主教的长信中讲述了中国自然地理的一些情况，包括中国的地理方位、邻国、行政区划、城市概貌、中国贸易、国家资源、婚丧礼仪、文化等；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是第一个探索从北京经拉萨返回欧洲的欧洲人，之后别人根据他的叙述编成《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富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书中除综合地介绍了中国

的情况外,还第一次向欧洲人介绍了西藏的情况;法国传教士李明作《中国现状回忆录》,书中几乎全是关于中国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上下两个部分。特别是对北京作了详尽的介绍,如北京的地理位置、气候情况、城区规模、城市面貌等。在谈到北京的风沙时,提出中国政府应从环境角度考虑风沙的治理;法国一耶稣会士作《中华帝国全志》,他没有来过中国,而是根据来华的传教士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写成的。此书是18世纪在欧洲流传最广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之一。

其他传教士也写过许多关于中国的地理著述,如葡萄牙克鲁兹的《中国情况记》,其中提到中国的长城,中国与邻国的地理关系等;俄国传教士亚金甫著的《中国及其居民、风俗和教育》等。

4 鸦片战争以后^[8-10]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中西强弱关系的变化也影响着传教士对华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当时中国因落后而对技术的要求使传教士对科学介绍与以前相比有了更广泛的参与,除纯科学性的研究、考察外,他们还翻译西书、发行报刊等。

4.1 传教士出版刊物

英国来华传教的牧师马礼逊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内容包括宗教知识、各地新闻和文化地理;马礼逊与人合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中包括不少有关西方的天文、地理、宗教、商业、科学、政治、国情等,它为以后许多中国学者的著述提供了许多翔实的资料,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曾引用其中的许多资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等主办的《中国丛报》和《美理哥国志略》,《中国丛报》中介绍了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美理哥国志略》主要介绍关于美国的地理知识;英国傅兰雅所创办的《格致汇编》,刊中所载的西方科技知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天文、地理、地质、地形学、生理学、医学、电学等等。

4.2 西方译著及著述

当时关于西方的译著,其中傅兰雅是贡献较为突出的一位。他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的28年间或自译或与人合译了许多西方的书籍等。如他在地理学方面的译著主要有《地志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地学稽古论》等。这些译著使中国人以最短的时间了解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加速了我国地理学发展的进程。

裨理哲于1848年著《地球图说》,书中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概况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人口、物产、风俗、宗教等资料,并配以图形,可读性较强。

4.3 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西方地理学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参考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地理科学知识或传教士本人的著述或译著,本着校正和完善的原则,或翻译或写作了许多中国人自己的

地理著述。

4.3.1 《四洲志》

由林则徐组织编译,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广州、澳门和南洋等地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如上述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等。

4.3.2 《海国图志》

为清中期著名思想家和地理学家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著成,书中他引用了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它的记述以地理描述为主,所介绍的地理范围几乎包括所有已知的区域。因此,它是我国当时关于世界地理最丰富的著述,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4.3.3 《瀛环志略》

由徐继畲所著,是继《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之后又一部较有影响的舆地学著作,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它的材料主要来自于美国的传教士雅裨理,包括与雅裨理的对话以及雅裨理的地图册、世界地理和宗教书籍等。

4.3.4 《海国四说》

由梁廷枏所著,全书共分为四部分,其中《合省国说》和《兰仑偶说》是关于美国和英国的史地著述。《合省国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美国史地的著述,其依据主要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

5 正确评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虽然对中国地理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毕竟是传教,而不是传播知识和技术。因此,他们在充当文化传播媒介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他们自身浓重的宗教观念和强烈的传教目的的影响,使他们有时要对西方的科学进行适当的隐瞒。如与他们的宗教观点相违背的日心说被推迟了很长时间才被传到中国;另外,由于西方地理学本身发展及传教士自身认识上的局限性,都会限制他们对科学的准确把握。

因此,我们应该用辨证的观点来正确评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在中西文明处于隔绝的情况下首先把西方先进的地理学有意无意地传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同时又将中国地理学介绍到西方,为世界地理学体系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身为传教士的他们出于对宗教的信仰及传教的目的,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使西方地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

[参考文献]

- [1] 道森(Dawson, C). 出使蒙古记[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6—7.
- [2] 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8): 203—240.

(下转第72页)

实。叶自成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在多极化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多极化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中国多极化战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仅有中俄两国合作，多极化进程还是难以实现。中国实行多极化战略的第二阶段，应当联合俄罗斯一起做争取欧洲的工作，并以此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多极化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放在争取美国转变态度与立场上来。多极化进程与美国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多极化进程首先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反对所谓美国领导世界的进程；另一方面，仅反美也难以建立多极化，因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影响是巨大的，与之对抗双方力量实在太悬殊^[6]。

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在这一方面如果进行更多的工作，有可能使美国逐渐放弃独霸世界的单极化倾向。同时，多与美国政界与战略界人士接触，多进行沟通和交换意见的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历史实践表明，有着“民族文化熔炉”之称的美国和具有兼容并包文化传统的美国人对多极化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多元文化并存与协调发展，这是世界历史的大趋势。

2.3 积极发挥在亚洲舞台的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应当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不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普遍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重点改善与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关系；二是把参与亚洲地区冲突的解决作为塑造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形象的主要舞台，当前主要应在朝鲜半岛和印巴冲突、巴以冲突的局势缓和起积极作用；三是中国应当与日本等国一起，在建立东亚的地区经济体系上

发挥自己的核心带动作用，从而形成繁荣稳定的东亚经济圈，扩大在世界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此外，中国的外交政策还需要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在增强文化感召力与“软国力”上下功夫。

总的来讲，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邓小平制定的外交方针应是中国当前的最佳战略。我们要有理智、沉着、登高望远的大国外交风度，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2]”。时间与机会在中国一边，当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时间，最需要的是发展环境，只要我们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趋势，再过几十年时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必将发生根本变化。

[参考文献]

- [1] 贾庆国. 中国不仅仅说不 [M].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6. 276, 253, 1, 3.
- [2] 徐滇庆. 世界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策略——世纪之交的理论思考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339—340, 326.
- [3] 吴廷华. 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N]. 环球时报, 1999—8—13 (14).
- [4] 陈平. 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572.
- [5] 凌志军, 马立诚. 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 [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9. 273.
- [6] 叶自成. 中国: 大国外交势在必行 [N]. “大家”文摘报, 2000—2—(14—20) (01).

(上接第80页)

- [3] 樊洪业.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12): 11—202.
- [4] 赵荣. 中国古代地理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4): 118—125.
- [5] 汪前进. 康熙铜版 皇舆全图 投影种类新探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1, (2).
- [6] 卢良志. 中国地图学史 [M]. 北京: 测绘出版社, 1984. 183.
- [7]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6, 5 (1): 235.
- [8] 李志刚. 百年烟云、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 [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 (7): 27—69.
- [9]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3): 287—334.
- [10] 鞠继武. 清代地理学家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纪念魏源诞生200周年 [J]. 地理研究, 1994, 13 (1): 100—103.